

導 言

珍藏于我國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莫高窟藏經洞的那五萬余卷完成於公元五至十一世紀的手寫卷和木刻本文獻，是中華傳統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它的發現同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並稱為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但百年前的中華，政治腐敗，國力凋敝，民不聊生。加之敦煌地處偏遠，敦煌文獻發現後並未被國內學術界所知。當地的統治者對這些珍貴的文獻並不瞭解，也無暇顧及和保護。相反卻招來了列強“探險者”的高度“青睞”。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於1907年、1914年兩次騙走了“近七千件相對完整可以鑒定的卷子，還有六千多件較短的殘片^①”。繼而，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於1908年騙走了經卷二十四箱，藝術品五箱^②。其中的大部分為精品。1911-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騙走了三百六十七卷、吉川小一郎騙走了一百餘卷^③。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S. F. Oldenburg)騙走寫卷三千餘卷^④。而“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佛經以外的文獻，其重要部分則多為英、法兩國所收藏”^⑤。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海內外已公佈的敦煌寫卷計53796號(含個別重號)，包括《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部分)13650號，《法藏敦煌西域文獻》6038號，《俄藏敦煌文獻》18214號(包括吐魯番、新疆、黑水城等地文

① 《英藏敦煌文獻·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為6038號，黃永武《敦煌寶藏》，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③ 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盜記》，載《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頁。

④ 傅振倫：《敦煌莫高窟學術編年版》，載《文物春秋》1994年版第2期，《俄藏敦煌文獻》收18000餘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0年版。

⑤ 《英藏敦煌文獻·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獻)^①，《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4005號，《甘肅藏敦煌文獻》696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335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246號，《浙藏敦煌文獻》201號，《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87號，《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80號，《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144號。這些卷子中有千餘件、百余種中國傳統典籍，《春秋經傳集解》即其中一種^②。

儒學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正宗，《春秋左氏傳》乃其核心經典“五經”之一，也是研究上古漢語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語料之一。相傳為左丘明所作。朱彝尊《經義考·春秋二》引劉向《別錄》稱：“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③據《說文解字·敘》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④漢時治《左氏傳》者，有賈逵、服虔、董遇、鄭眾、穎容諸家，晉人杜預因之分經比傳撰成《集解》。唐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為《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實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萃為一書。輾轉至清，版本各異，訛誤繁多。嘉慶二十一年，阮元等以宋刻十行本為底本，以唐石經、宋經注本等為校本，重新校理，即今《十三經注疏》本，並有《校勘記》四十二卷。由於阮氏為通儒大家，兼之廣采眾善，正本清源，故《十三經注疏本》廣為流傳。

阮氏所依底本為宋刻本，所用校本除唐石經外主要為宋、明版本。而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多為六朝至唐初所抄，儘管抄寫者人多手雜，水平參差，有諸多不“規範”之處，但其早于宋本數百年，免去了諸多抄襲改易之誤，理論上講更接近原本真跡。這對於恢復《左傳》及

① 《俄藏敦煌文獻》所收 19092 號中，Дх. 12910 號至 Дх. 14156 號為馬婁夫收集的于漢文獻，未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2001 年版。

② 參閱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盜記》，載《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③ 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④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1963 年版，第 315 頁。

杜注之原貌，就顯得彌足珍貴。同時，傳統經典經過六朝、唐人抄寫，亦當有不少通假字、孳乳字及異體字雜入其中，後世刻本改俗從正、去偽存真，亦勢所必然。但在整理過程中，即使名家也難免千慮一失。對此，羅振玉曾說：“經典數經傳寫，別構之字多有因仍未改者。特先儒別字，後人弗識，而鄙陋之士又曲造音訓，不知妄作。小學之不講，無怪經注之多支離也。^①”但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寫卷中保存的這些不同於傳世本的“異形字”恰恰是研究漢字形義關係、音義關係及其變遷的難得的寶貴資料。故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儒學大師劉師培在讀了法藏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殘卷）“P·2540 號”後讚歎：“使全帙具存，當與金澤文庫本媲美矣^②。”王重民先生更認為“（從晉初到隋統一時期的寫卷）所存即便都是殘本，也是原書的本來面貌，遠勝輯佚本^③。”潘重規先生更直言不諱：“古抄卷子，珍愈拱璧^④。”

一 本課題前人研究概況

自 1909 年羅振玉、劉師培等據伯希和提供的敦煌文獻照片進行初步校理研究始，敦煌學已經走過了百年的學術歷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們注意到，儘管敦煌學以研究四部典籍而起，但在百年學術歷程中，尤其是其蓬勃發展的近半個世紀中，對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近千件、一百余種中國傳統典籍的研究卻相對冷寂得多，寫卷《春秋經傳集解》亦不能幸免。迄今為止，對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殘卷）的整理、研究多屬概言、舉例性質，尚未全面展開。今天所能見到的主要成果有：

1 羅振玉：《〈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1909），收入《雪堂校勘群書敘錄》。

① 羅振玉：《碑別字·序》，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卷提要》，載《劉師培全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王重民：《敦煌四部書六十年版》，載《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18 頁。

④ 潘重規：《倫敦藏斯二七二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敦煌〈毛詩音〉殘卷綴合寫定題記》，引自《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香港西亞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77 頁。

- 2 劉師培：《左傳杜注集解昭公殘卷、定公殘卷》（1910），收入《敦煌新出唐寫卷提要》，載《劉師培全集》第四冊。
- 3 羅振玉：《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1917），收入《雪堂校勘群書敘錄》卷下。
- 4 越致：《敦煌左傳殘卷校記》（1933），載《藝觀》NO. 4. March (1933)。
- 5 陳鐵凡：《法京所藏敦煌〈左傳〉兩殘卷綴合記》（1970），《書目季刊》Vol. 5. No. 1. 1970。
- 6 陳鐵凡：《〈左傳〉節本考》（1970），《大陸》Vol. 41. NO. 7. Dec 1970。
- 7 陳鐵凡：《倫敦、巴黎兩本敦煌手卷及其選在〈群書治要〉中〈左傳〉部分之不同》（1971）。
- 8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春秋經傳集解》部分），商務印書館（1958）。
- 9 王重民：《春秋左氏抄》，《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1979）。
- 10 王重民、黃永武：《敦煌古籍敘錄新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11 黃天忠：《淺論敦煌寫卷中有關春秋經傳的學術背景與價值》，《高雄師大學報》第9期（1997）。

上述成果涉及到的敦煌寫卷有 P. 2540 號、P. 2523 號、P. 2562 號、P. 2509 號、P. 3729 號、S. 85 號、S. 133 號、S. 1443 號等及李鳴南藏昭公四年至五年殘卷^①，《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經部一）還附有 P. 2767 號影印件。這些成果對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的整理與研究無疑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由於種種原因，又呈現出如下特點：

其一，主要是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敦煌殘卷進行收集整理，並未從語言學的角度展開研究。

其二，多為題跋、敘錄，並未全面校理，篇幅以二、三百字者為多。

① 《英藏敦煌文獻》為斯坦因(Aurel Stein)所掠者，依學術界慣例稱“S. 某某號”。《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為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所掠者，依學術界慣例簡稱“P. 某某號”。

其三，僅涉及到部分殘卷。

總之，前賢對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殘卷）的整理、研究多屬概言、舉例性質。對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進行全面校理，並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前人尚未進行。

二 “異文”說略

語言學範疇的“文”，主要意義有三種：

其一，獨體字。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①

其二，泛指文字。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②。”

其三，言辭、文辭。

“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③

本課題所謂“異文”之“文”指第二種，即泛指文字。所謂“異文”，即如陸宗達、王寧先生所言：“指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異，或原文與引文用字的差異。”^④即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與以阮刻十三經本和《四部叢刊》本為代表的傳世本相比所使用的不同的文字。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異形字。即在相同的語言環境（上下文）中記錄同一個詞的同一個義位時所使用的不同形體的字。

據我們調查，與傳世本相比，寫卷《春秋經傳集解》中所使用的異形字有五種主要類型：古文—今文；本字—借字；源字—孳乳字；本字—同源通用字；正字—異體字。每種又有若干細類。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54 頁。

②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1963 年版，第 9 頁。

③ 杜預：《春秋·序》，《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2 年再版影印本。

④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6 頁。

其二，異詞。表現為因記錄不同的詞語而使用的不同的字。

據我們調查，這些“異詞”衍、脫、倒、誤文均有，具體可分為寫卷誤用者，傳世本誤用者，寫卷與石經等版本或《經典釋文》所引相同，因而可備一說者等幾種主要類型。既有阮元等前賢已校出者，又有因材料所限前賢未發現者，還有前賢誤校者。

異文是考察、訓釋經典字詞音義的重要材料。漢代以降，考察分析異文是歷代經學家和小學家研究考證古代典籍，探討漢語發展演變規律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被稱為“五經無雙”的許叔重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的奠基之作《說文解字》中曾多次博引異文以說解音義。歷代訓詁學家運用異文辨明經義，廓清疑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清人更是將經典異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僅以《春秋經傳》的校證研究為例，即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趙坦《春秋異文箋》、臧壽恭《春秋左氏古義》、李富孫《春秋左氏異文釋》、盧文弨《春秋左傳注疏》、惠棟《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及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等，其共同點是以廣博搜取前代經典中相關的異文作為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大多能夠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精見卓識頗多。只是因為歷史的原因，上述大家並未能發現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的異文，羅振玉、劉師培等學者、專家亦基本上只是指出其所見到的少數幾卷的異文，未能展開研究。

三 本課題的研究目的

其一，以寫卷《春秋經傳集解》的異形字為考察物件，構建反映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漢字異形字體系。

其二，探討異體字構字理據、形義關係和漢字字體演化的規律。為研究探討中古時期漢字的發展演變提供可資借鑒的材料和可信的理論觀點。

其三，考察分析許慎所謂“古文”在寫卷《春秋經傳集解》中的使用情況，分析其形義關係，為古文古義的研究提供可信的事實和理論支持。

其四，通過對寫卷異文中的孳乳字和同源通用字的窮盡性、定量分析，探討漢字孳乳演變的規律和使用特點。

其五，通過對寫卷異詞的擇要考證，正本清源，糾正傳世本缺誤，使傳世本《春秋經傳集解》更近於原貌。

四、本課題的研究方法

本書以文獻學研究為基礎，以語言學研究為重心，二者交叉、相容。基本方法是在古文獻考證的基礎上從漢字字源學、構形學、形義學及訓詁學的角度對寫本與傳世本之“異文”進行全面研究。

1. 語料校錄

首先，利用現有條件，“竭澤而漁”式地佔有原始材料。然後參照前賢成果進行定性、定名、定年。在此基礎上，以阮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和四部叢刊本中的《春秋經傳集解》（上海涵芬樓藏宋刊巾箱本的影印本）為主要校本進行比勘校錄。此外，漢時治《左氏傳》名家賈逵、服虔等人之作全本已佚，其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注本乖異。清人洪亮吉引賈逵、許慎、鄭玄、服虔之訓詁糾正杜注，據班固、應劭、司馬彪等人地理之說糾正杜注，“以前人以前之人證前人之失”，據漢、唐石經與《釋文》糾正杜注中俗字，集成《春秋左傳詁》一書，“欲存《春秋》、《左傳》之古學^①”。其文多有的當之論。王引之《經義述聞·左傳述聞》將聲韻、文字、訓詁融會貫通，以校證《左傳》及杜注之失，為清代考據學派有關《左傳》考證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章太炎《春秋左傳讀》將《左傳》與周秦兩漢典籍比較研究，發疑正讀。在考訂詮釋《左傳》古字古言、典章制度、微言大義方面卓有成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用現代學術理論和方法校理《左傳》，對前人成果廣甄博采，時有卓見。這些學術名著及阮元的《春秋左傳正義校勘記》等，都是錄校、研究的重要參考。

2. 異形字研究

異形字指凡與傳世本義同而形不同的字，傳統上常以“俗字”稱之。本書依據現代文字學理論，以王寧先生創立的漢字構形學理論為主要指導，通過考察“異形字”的構形模式和造字理據，從形體構建和表義特點

^①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序》，載《皇清經解續編》，上海書店1988年版。

兩個方面逐一進行分析。對傳統所謂“俗字”做出符合現代文字學理論原則的分類，並做出理論上的闡釋。

3. 異詞研究

本書在繼承傳統小學考證方法的基礎上，按照業師宋永培先生倡導的“文、史、哲、訓相結合”的方法詳加考證，以期對阮本及阮校有所補益，並據此新材料對前賢相關學術論爭提出自己的觀點。

五. 本課題的主要內容

本書包括六部分內容：

1. 寫卷《春秋經傳集解》定性、定名、定年考論

通過對國內能見到的近五萬卷敦煌文獻（占全部已有記錄的敦煌文獻的90%以上）進行全面、徹底的搜尋，首次確定目前國內所能見到的寫卷《春秋經傳集解》共三十八件。這三十八件卷子中，因不避唐諱，可直接定為六朝寫本者十九件；因“民”、“世”等字省筆避諱，可徑定為唐寫本者二卷；因殘損過多，所存文字太少而不便遽定者十四卷；一卷之中的避諱字，或省筆或不省筆，存疑者三卷。其中定為六朝寫本的卷子多為經、傳文俱全、且篇幅較長者，如S. 85號存原文212行，計5500餘字，為英藏《春秋經傳集解》寫卷中最長的一篇。P. 2509號存原文334行（含殘行），計11987字，為迄今所能見到的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中篇幅最長的。因此，若從保存字數上分析，六朝本更占絕對多數。

這三十八件寫卷從來源上可分為兩類，一是《春秋經傳集解》的抄寫本，共三十二件，二是刪節本，共六件。

與今日流行的《四部叢刊》本和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相比，共發現“異文”5800條，其中詞語多少、用詞不一所形成的異文1800餘處，其中“也”使用不一造成的異文近1100處；詞語相同而用字不同所形成的異文4000餘處，限於篇幅，本書僅對除“也”字使用之外的其他有學術價值的異文擇要進行了考證研究。

2. 寫卷異文中存留古文考論

“古文”即漢代發掘出的戰國時期與秦篆不同的東方六國文字。

本書所謂“古文”則專指許慎《說文解字·敘》中所指、《說文解字》中所存之古文。據調查，目前保存在寫卷《春秋經傳集解》異文中的“古文”共十五字，即“礼、庙、迳、珪、弃、无、叟（攸）、𨾏（𨾏）、强、余（余）、二、御、明、盟、乘、𠄎”，其中包括《說文》標明“古文”者七字，前賢考證、推論為古文者八字^①。本書從漢字構形學、形義學的角度逐一進行了考釋，發現：

其一，今日所見寫卷《春秋經傳集解》中的古文，已並非戰國時期的原形，而是“隸化”、“楷化”了的“古文”，且所存數量已經不多。

其二，所存古文形體距筆意較近，便於因形考意。

其三，所存古文在書寫方面呈現出簡潔明快的特點。在十五個古文中，除了古、篆文形體相同的“明、盟”以外，筆劃少於傳世本所用楷化形體的有十一個，其中只有“𨾏、珪”筆劃稍多。

我們認為，表意的明確性代表了漢字的特質，形體的簡約性代表了漢字的工具性特徵。古文的存留、演變情況表明“表意的明確性和形體的簡約性的統一”是漢字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

3. 寫卷異文中本字、借字考釋

寫卷異文中計有本字、借字 31 組。具體情況有五種：其一，寫卷使用本字，而傳世本使用借字；其二，寫卷使用後起本字，傳世本使用借字；其三，傳世本使用本字，寫卷使用借字；其四，傳世本使用後起本字，寫卷使用借字；其五，寫卷、傳世本皆使用借字。

寫卷異文中本字、借字的存在與使用顯示出三個特點：

其一，寫卷中本字與借字的使用在不同的卷子中並不一致，表明魏晉時期這些字的使用正處於發展演變時期。

其二，寫卷中所用的借字大部分與本字形體相近、相關。學術界一般認為，借字與本字的關係只是讀音相同或相近，意義和形體上並無關係。然寫卷中使用的借字 85% 以上形體上與本字相近或相關。其中原因當是用字者書寫時不僅找同音字來替代，而且相對於異形字來說，更容易找形近字替代。這和用字者記不清楚原字的寫法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用字者

^① 杜預注文中還有古文“一、睪、感”三字，因非經、傳文，故不做考證。

對相似字的認同心理在起作用。

其三，某些借字的運用與漢民族的傳統文化有關。如“燕”與“宴”。

寫卷中本字和借字的存在保存了近于原本用字的實證，為分析、研究漢字早期的形義關係、具體運用及其演變過程提供了實際例證。不僅有利於分析漢字的造意，研究其形義關係，而且可以據形判斷其所表示的古義，有利於研究詞義的差異與演變，也有利於辨清學術史上的一些爭論，並發現前人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4. 寫卷異文中源字—孳乳字、本字—同源通用字考釋

4.1 我們把出自同一語源，語音相同或相近，意義相通的一組詞稱為同源詞。記錄同源詞的一組字稱作同源字。記錄源詞的字稱作源字，在詞義派生的推動下，由源字分化出新形而產生的新字叫孳乳字。同一源字孳乳出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孳乳字相互通用，叫作同源通用。同源通用現象中筆意相對明確，有造字理據的孳乳字稱作本字，形體與該使用意義不相符，缺乏造字理據的孳乳字稱作同源通用字。

4.2 寫卷異文中使用源字十四例，孳乳字二十三例，計三十七例。

從源字與孳乳字所表示的意義方面分析，可歸為三種類型：第一，源字記錄的是詞的本義，孳乳字是為源詞的本義造的新字。第二，源字記錄的是詞的派生義，孳乳字是為詞的派生義造的新字。第三，源字記錄的是詞的本義和派生義，孳乳字既為詞的本義，也是為詞的派生義造的新字。

寫卷、傳世本異文中所使用的孳乳字的構形方式有三種：第一，孳乳字在源字的基礎上增加一個表義構件。第二，孳乳字改換源字的構件。第三，孳乳字是原有古文的簡省。其中第一種計 33 例，占 89%。據此，可以認定，在源字的基礎上增加一個表義構件，是孳乳字構成的基本方式。

異文中源字的使用為我們認識漢字形體由源字到孳乳字的演變提供了早期例證。對漢字形義研究的“溯源”工作具有實證性的價值。源字不僅保存了上古典籍的“古義”，且相對於孳乳字來說，更接近于漢字的古形，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形”工作，便可找到該字的筆意，從而有利於進行源頭性的形義關係的梳理和構形理據研究。

異文中孳乳字的使用證明了漢字系統演變和漢字使用的復雜性。孳乳字既然是為解決漢語詞彙中“音少而義多”的矛盾而產生的，按理說當孳